

道

德

中
华
传
统
优
秀
道
德
文
化
丛
书

卞孝萱 主编

诗歌与 道德名言

莫砺锋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文

化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编

卞孝萱 主编
周 群 副主编

诗歌与 道德名言

莫砺锋 著

中
华
传
统
优
秀
道
德
文
化
丛
书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与道德名言/莫砺锋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5

(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卞孝萱,周群主编)

ISBN 7-80643-682-0

I. 诗... II. 莫... III. 道德修养-诗词-鉴赏-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120 号

诗歌与道德名言

著 作 者 莫砺锋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爱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印 张 8

印 数 1-1500 册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682-0/B·33

定 价 1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序

王霞林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的文化，其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伦理道德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仍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精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重视现世的生活，而将彼岸和鬼神信仰置于其后。受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神关系方面，神本主义始终未居主导地位，显示了与西方文化迥然有异的品格。孔子还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哲学和以仁义胸怀、忠恕品格、自强不息等为标准的人格理论。这些理论学说，不论对于当代人生追求，还是对于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都具有较大的启迪和教益。

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乐群”精神。《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荀子·劝学篇》讲道：“礼之敬文也，乐之

中和也。”因此，“乐”的本质即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乐”为本，“礼”为“天地之序”，“乐”为“天地之和”，“礼”“乐”的结合即是在人伦秩序中追求和谐。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实现是以强调人的社会性为前提的。事实上，孔子仁学的最基本的旨义在于“爱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希望有所成就，希望达到某种目的，要想到别人和自己也有同样的心愿，应该设法成全别人。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愿做到的事情，也要想到别人也具有同样的感受，不要强加于别人。孔子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人、我、群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将家庭道德延展扩充，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家国同构。重伦理、倡道德是调和家庭成员关系的需要，也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

与此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的特征在政治上的体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调用道德教化来培育民众的耻感，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强调用道德的办法来感化民众，用礼义规范来引导他们，便能使之产生道德自觉，守法遵礼，知耻从善。另一方面是强调执政者的德行对于统治

的效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表述的这种道德政治理念。就人与国家的关系来说，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方面的论述更多，比如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主张为了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和弘扬的优秀的道德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特征还表现为道德论与宇宙论理论体系畛域难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十分注意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伦理与宇宙谐和为一的境界。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品质的又一体现。这对于推进今天的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启示。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天乃至未来，仍以其积极的内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任何一种道德都有继承性。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

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我们注意到，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传统道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社会的巨大变革急切呼唤建构适应现代文明的现代中国伦理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道德文化要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否认一切优良传统，也不能厚古薄今，甚至把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某些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生活中来，更不能用封建糟粕来塑造新一代。对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综合创新。一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要择各家之精华，加以梳理和分析，使之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道德。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并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相综合，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创造出先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

在全国上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付梓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不同侧面对我国古代道德文化进行了评价、诠释，期以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为读者

提供一个明了易晓的道德文化读本。相信此套丛书会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有所帮助。是为序。

2002年3月15日于南京

《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前言

当《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出到五十部的时候，主编匡亚明同志曾对中共江苏省委《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霞林同志谈过，编好《评传丛书》后，还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专题的和综合的研究。现在向广大读者奉献的《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即属于专题性的研究课题之一。

自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重的指示以后，道德建设已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本丛书顾问王霞林同志及时地指导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编一套《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将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提炼出来，汲取其富有时代性的内容，普及到群众中去。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心”决定由《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卞孝萱教授任《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主编，“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群教授任副主编，负责实施本丛书的组编工作，并于2001年4月28日召开了作者和出版者会议，讨论决定了选题、体例、出版日期等，立即投入写作。

200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它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发扬了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了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它是中国全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贯彻落实江总书记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的重大举措，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纲要》是照耀这套丛书的灯塔，同仁们更加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加快了步伐，将于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时，推出如下八册：

《哲学与道德智慧》 本册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道德智慧的独到见解。作者以辨析科学与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区别为切入点，本着追溯历史原创精神的宗旨，以先秦诸子思想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先秦儒家、道家思想为主要考察对象，从道德与意志、道德与情感、道德与审美、道德与知识、道德与人格、道德与理想、道德与境界等七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智慧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结论是：道德智慧是对人生之道、人际之和、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所作的哲学追问，而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道德智慧和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政治与道德教化》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道德密切相关，政治威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表现。作者以辨析中国古代道德政治为切入口，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

的本质特征、形成原因,研究了道德教化的丰富内涵、实施方式及其对政治的巨大反作用,探讨了政治与道德教化、德治与法治的复杂关系,力图为当今官德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作者认为:德治与法治各有其优势,礼与法须相互补充,德治与法治统一于治国的政治实践之中。全书分“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民惟邦本”、“以廉为贵”、“教化为本”、“任贤使能”、“刑以弼教”七个部分。

《教育与道德培养》 本册阐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中国古代有发达而完备的教育制度,也传下来丰富而优秀的教育思想,对德育的关注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在先哲看来,教育固然要“授业解惑”,但更要“明人伦”,“培人性”,“化性起伪”,提升人的境界与层次。古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个突出的主线就是“修德养性”。先哲强调:人只有经过教育的熏陶和抟塑,方可“成人”。在日益关注素质教育的今天,古代的德育理论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宗教与道德劝善》 本册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异同、联系与相互影响,之后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探讨了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慎终追远”旨趣、天命信仰的“以德配天”特色及儒家思想“神道设教”功能;对于道教之崇道求仙与积德行善的相互关系,作者以几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为根据,深入揭示了道教如何把行善积德作为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基础;最后,

作者着重探讨了中国化佛教是如何把五戒十善与忠孝仁义、治心与治世、做人与做佛统一起来的。全书既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的基本义理与思想,又史论结合地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伦理价值取向与道德教化功能。

《诗歌与道德名言》 作者从中国古典诗歌中精选了二百余条富含道德意义的名句,按内容倾向分成进德修身、爱国爱民、刚强坚毅、清廉正直、忠贞不贰、善善恶恶、谦逊淡泊七大类,从而展示了古典诗歌中所包蕴的丰富的道德价值。每条名句下面均附有诗歌原文,并对作品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进行论述。所选名句大多为文情并茂、精警易诵的格言,作者揭示其道德意义,说明其何以能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成为激励读者增进道德修养的座右铭。

《戏曲与道德传扬》 作者从中国传统戏曲寓教于乐的艺术追求出发,阐明了戏曲活动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书中考察了中国古典戏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论证了戏曲传扬道德的积极意义,指出其历史上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在论述戏曲创作对社会效应的自觉追求时,作者具体评析了戏曲史上的诸多名著,尤其着眼于以颂扬爱国主义、公忠廉洁等美德为主题的代表作,展示了这些作品对大众道德价值观念的深远影响。还论述了新中国戏曲艺术“推陈出新”对弘扬新道德风尚的重要性,肯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戏曲

艺术与道德传扬的关系。

《小说与道德理想》 本册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体现的道德理想。古代小说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传统道德内容。自从小说形式诞生以后,它又在很大程度承担着道德教化的任务,尤其是通俗小说对民众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分析古代小说中的道德理想内涵,对我们了解古代民众的道德理想、道德追求,探索古代社会道德理想的内涵与形成原因,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仔细辨析古代小说中所蕴涵的道德观念,对当代读者正确理解、接受古代小说作品,建设符合当代需要的道德理想,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妇女与道德传统》 本册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剖析批判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和迫害,对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女性美德给予了叙写称颂,以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展示古代女性的道德风范、高尚品格和道德情操,从而对新时期妇女道德规范的重新树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现代妇女伦理道德建设应摒弃封建糟粕,继承和发扬其中蕴涵着女性文化、具有超时代性与现代价值的传统妇女美德,建立历史延续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现代妇女伦理道德规范。

上述八册围绕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共同的主题进行论述,弘扬精华,摒弃糟粕,各册内容既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我们发扬学术民主,在观点上各抒己

见,自由发挥;在文字上各显风采,不拘一格。各册的作者都是学植深厚的学者,驾轻就熟,可以保证达到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妇女与道德传统》一书,特请一位女博士执笔。因为我们考虑到以女性写女性有心灵的默契,而男性写女性终隔一层。编写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尚属创举,我们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得好些,但限于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求各界人士指正。

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卞孝萱 周 群

2002年3月1日

序 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浓厚的道德倾向，其二是浓郁的审美倾向。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善”和“美”。对“善”和“美”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努力提升自身的人生境界的原初动力，是他们为五千年的光辉文化所奠定的核心内蕴。

首先，中华文化中最高的境界是道德而不是智慧，而这种道德又是界定在人生范围之内，它并不是对神灵旨意的遵从，而是人们内心的自律。儒家尤其强调道德不应是外在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是内心情感的合理流向，任何外在的仁义举动都是内心德性的自然体现。正如孔子、孟子的格言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无论你是修身养性还是施惠及人，都会在内心产生极大的愉悦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正是指这种境界。相对而言，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往往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和服从，等而下之者甚至出于对天国入场券的期待，总之或多或少地出于外在因素的驱动。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当

古代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时，中华的先民们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并不是作为人类异己力量的诸神，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发明者。既然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灵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于是在先民们的心目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内心，也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中华先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他们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周易》中的卦象、汉字的象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性的研究，而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正因如此，中华的先民们在创造自己的光辉文化时，并不沉溺于烦琐周密的逻辑推理，也不追求苦行僧式的宗教

行为，他们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他们以审美的态度在平凡生活中获得愉悦感。孔子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庄子崇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终极真理，正是先秦思想家共有的审美倾向的典型表现。

那么，“善”和“美”这两个特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交汇于何处呢？应该说有许许多多的交汇点，然而最显著、最光华夺目的交汇点无疑是古代诗歌。由于“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中华先民们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所以中国的古代诗歌既不是颂神乐歌，更不会被哲学家逐出理想国。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先民们的诗歌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就像《诗大序》所描绘的那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过程无需乞灵于神祇的参与，也不会导致迷失自我心智的迷狂状态。虽然在远古时代，诗是与乐、舞密不可分的，但是在表意的明晰性上诗当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诗歌的载体——文字的稳固性又远胜于乐、舞，所以诗的地位日趋重要。诗歌终于成为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国。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子弟，《诗经》得以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老子》全书皆为韵